

13107

浦城文史資料

第十輯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浦城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浦城文史资料

第十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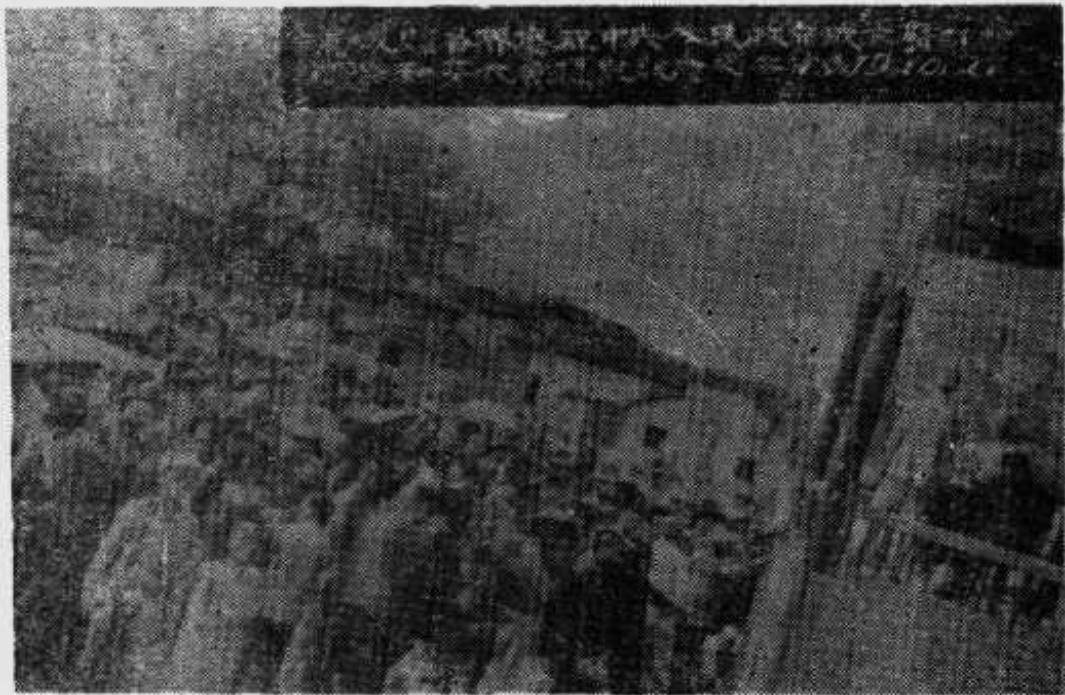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浦城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一九八九年九月



献给建国四十周年

罗宝珊（浦籍·广西美术学院副教授）



县各界人民庆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会场一角



二排左四为县委书记刘健左五为韩向阳同志

(以上照片为福建省计划生育办杜灵芝提供)



1950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浦城办事处升格为
人民银行浦城支行 (吴映川提供)



浦城新华书店的前身——群众书店 (前排左一为经理姚吉生、左三为县委宣传部长韩向阳) (姚吉生提供)



参加建阳地区抗美援朝代表会议浦城各界代表
(山西大同电厂雷宗杰提供)



省地赴朝慰问团来浦作报告离浦时各界人民热烈欢送
(福建省老干局赵志万提供)



县老年体协活动剪影——练功十八法



县委、人大、政协领导邱阿旺、田健、雷芳仁、曾锡章
在县老体协一届运动会上 (以上照片为县老体协提供)



县老体协门球队（代表南平地区）参加“避暑山庄杯”全国门球邀请赛获第六名。（县老体协提供）



全国侨联副主席、省侨联主席王汉杰1988年7月视察我县侨友商店 (县侨联提供)

目 录

战斗在“天堂”的地狱里

——在苏州军人监狱前后……叶独青（光焕）（1）

统战工作的片断回忆……………黄石坚（王刚）（14）

在浦城农校的岁月里……………白 文（22）

忆在建师地下斗争二三事……………蔡 平（25）

浦城，我怀念你！……………夏广文（29）

漫忆参加军政大学的日子……………曾锡章（33）

忆二野军大五分校……………周芳贤（41）

忆念福建公学……………陆泰安（51）

革大政治研究班记事二三……………刘子进（57）

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回顾……………詹秉辑（61）

赴朝参战前后……………李达荣（75）

“五·一三”前后的片断回忆……………胡邦定（82）

五十年代工会工作侧记……余郇功 杨炜明 吴承达（85）

回忆浦城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情况……………李傲霜（95）

从事理论教育工作的片断回忆……………邹章松（101）

建国后浦城体育事业纪略……………陈佩如 叶邦彦（108）

- 深切的怀念——记程宗波同志二三事………李子柏（114）
张传仁与浦城棉花生产……………祝凌云（119）
五十年代下乡琐记……………詹秉轴（124）
大学生生活二三事……………单河清（129）
废机场复耕记……………程度口述 张自楷整理（134）

- 浦城方言探源……………叶中檀（136）
日本出土的大口窑合子……………赵洪章（149）
浦城县老年人体育协会纪事………浦城县老年人体协（154）
爱国心·故乡情……………承达 历健 辑录（166）

三 补 白
三 浦一中学生李春漫高考夺魁（13） 梁清强出席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32） 中央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闽浙赣分团第五分队访问浦城（40） 浦城一区民校（50） 城关首次少年宫活动（56） “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在浦发行（60） 文史工作座谈会感赋二首（74） 《一叶落》咏兴浦路（81） 仙楼山越王台题联（107） 我县培育杉木实生苗始于1954年（123） 许副县长打虎（133） 际下水库（135） 庆祝浦城解放四十周年（153） “五·一二”大街（165）。

题字、封面设计……………姚吉生

战斗在“天堂”的地狱里

——在苏州军人监狱前后

叶独青（光煥）

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座落在江苏省苏州盘门外的“江苏省军人监狱”却是一座人间“天堂”里的地狱。在这座人间“天堂”的地狱里，我度过了五年的铁窗生活。许多当年力主抗日爱国的仁人志士在狱中的斗争精神，至今回忆起来，仍令人感动不已。

“爱国有罪”被捕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包括国民党内部的爱国人士的强烈的义愤，上海、北平、南京等地的广大青年学生和工人的抗日救国运动更是风起云涌。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国民党反动派当局与日寇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该协议可耻地规定了不驻军、不设防，阴谋把上海变成“自由市”。因此，全国各地抗日救国浪潮更加高涨。在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下，

由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与日寇签订出卖上海的停战协定联合会（简称“民联”）等八十多个团体于同年七月十七日在上海市胶州路共舞台召开抗日爱国集会。大会的任务是：（一）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援助东北各地区正在浴血抗日的义勇军；（二）反对国民党当局出卖上海，同日寇签订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三）成立江苏省反帝大同盟和江苏省民联，并准备推选代表，参加将于八月一日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成立全国反帝大同盟和全国民联组织，以进一步推动全国抗日救国运动。

由于当时在我们党内，王明的“左”倾路线统治着中央，在召开大会半个月之前，就在上海几家大报上公开刊登了召开大会的通告，甚至把筹备处的地址——上海云南路会乐里三弄二七九号也公布了。七月十七日一早，国民党特务和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包打听”都已纷纷聚集在会场的周围，气氛十分紧张，而主持大会的领导还错误地决定指派我和刘志超等四人到附近警察局和巡捕房去请求派员来保护会场。当出席大会的代表基本到齐，正准备举行会议时，我们四人已被扣押在囚车上，会场也被大批警察、巡捕和国民党特务分子紧紧地包围，当场有八十八位同志以所谓非法集会违反《危害民国治罪条例》予以逮捕。我们在上海市警察总

局关了两、三天后，押解到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国民党中央认为我们这次大会是共产党召开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案情特别严重，于七月二十九日夜间，把全案“人犯”押解到南京国民党政府军政部军法司看守所审讯了将近一个月，毫无结果，国民党中央又下令把我们全部押解到被称为“老虎口”的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里去刑审。在“老虎凳”、“山羊吊”、“针刺指甲”和电刑等惨无人道的酷刑摧残下，李逢春、王灿、李文达、张德生经不起敌人法庭刑审的考验叛变了。由于叛徒的无耻出卖，肖万才（又名春生）、许清如、曹顺彪、柳日钩、许金标、陈土生、徐阿二、邱文治、崔阿二、王得盛、钟朋友等十三位同志（其中绝大多数是工人同志）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壮烈牺牲。其余七十多位同案战友被判处五年至十八年的有期徒刑。除肖小宝（肖明）、易操德（易纪君）两位女同志移押南京中央监狱外，其他战友都在当年十月一日被装上运牲口的闷罐车，押解到“天堂”里的地狱——苏州盘门外江苏省军人监狱里去坐牢。

狱 中 的 战 斗

这座军人监狱是旧军阀时代的江苏省造币厂旧址改建

的。它共有“改”、“过”、“自”、“新”四大监房，另外还有病人监房。我们这批政治犯都被监禁在“过”字监房。这座监房共有十四个囚室，我们分别监禁在一至十三号牢房里。我和周正余（学生，福州人）、李月红（上海纱厂木工）、托洛斯基陈独秀取消派的中央委员郑超麟等十五人，挤在一个十来平方米的牢房里，象铁盒子里的沙丁鱼一样，睡时连翻个身子都很困难。当天傍晚，我们这一大批囚徒进入这座地狱时，突然增加了七十五名政治犯，吃饭时，连碗筷都供应不上，只好用手抓饭吃了。晚饭后，大家都轻声地唱起了《国际歌》，默哀悼念十三位烈士英勇就义的英灵。监狱设有缝纫、织袜、糊火柴盒等工场，囚徒每天劳动长达十个小时以上，待遇每月只三元，但政治犯还不让参加工场劳动。

监狱里伙食吃的都是“地脚米”（仓库里受潮发霉的陈粮），其中还夹以砂、石、稗子、谷壳、米虫、老鼠屎等。菜是市场上卖不了或拣来的“菜帮子”，有时不洗就放到锅里煮，根本吃不上什么油。囚徒的伙食费名义上为每月四元五角，实际上吃不上两元钱，一天两餐还吃不饱，普遍患了浮肿病（又称脚气病）和不同程度的肠、胃病，风湿性关节炎。陈佛生等同志就是在这暗无天日的地狱里被折磨而惨死

于肺痨症的。

我们把各号监房起个密码代号，以便保持秘密活动联系。每个牢房都有我们可靠的负责人，负责联络并组织学习。我当时是十三号牢房负责人之一。我们在监狱的任务：一是组织发动监狱里的难友向监狱当局要求改善非人的生活待遇；二是学习文化与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宣传党的停止内战，团结一致对外的抗日救亡政策。

我们进监后，苦于看不到报纸，后经教育争取了看守人员中同情爱国抗日救亡的，并给相当代价，花两个银圆买一份报纸。我们每次拿到报纸，就由文化政治水平高的、笔手敏捷的陈佛生、李季俊（杨超）等同志负责综合新闻与编写，并由买报纸的看守员把风。由于彼此配合默契，即使失了“风”，也没有暴露。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我们从报纸上看到中央苏区工农红军退出中央根据地——瑞金的消息，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宣传红军失败了。我们搞不清楚事实真相。不久，新进监的政治犯难友，告诉我们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是为了北上抗日，革命前途乐观。但当时同监的三号和九号牢房有个别人悲观失望，在牢房里唉声叹气，消极悲观，认为出狱没有希望了。我们发觉后，决定暂不往三号和九号牢

房传递重要条子，以防不测。

一天，由于三号和九号牢房负责人麻痹大意，正在传出条子的时候，被三号的陈铭俊（又名陈穆）和九号的钟策（又名王良）抓到了，他们就大声叫喊看守，无耻地爬出去向监狱的典狱告密了。因此，陈佛生、陈广和、章夷伯、王致中等八位同志，还有帮助我们秘密递送信件、报纸、进步书刊和互济会救济品的看守陈麻子和外役小李，都被押去南京分别加了刑期。陈广和（又名顾卓新）等被叛徒陈铭俊在法庭上“咬”过，被加长刑期达八年又两个月。这次由于被叛徒破坏，监狱里的白色恐怖更加严重，经常突击搜查牢房，看守人员日夜不停地打开门洞察看政治犯的动静，稍有不顺眼，就无端遭毒打，我就被毒打过多次。就这样，我们提心吊胆地在地狱里度过惨无人道的囚徒生活约半年之久。

在牢房里当局只准看《三民主义》、“佛经”一类书籍，别的书籍一律不准阅读。后来争取了同情我们处境的看守员，给以一定的代价为酬劳，才秘密送进一些外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由懂外文的陈佛生、武翰章（武绍文）等同志翻译后传阅；以后又弄到一些中文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进步文艺书籍，如日人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美国摩尔根的《原始社会》、苏联列昂节也夫的《政治经济学》、马

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郭沫若的《甲骨文》、高尔基的《母亲》、《我的童年》等名著，以及其他历史书籍。后来甚至在外边市面上都不容易买到的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基础》等名著在监狱里都能看到。这些书籍对大家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有很大教益和提高，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对革命前途的信心和对敌斗争的坚定性。

监狱当局为了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在政治思想上制造混乱，利用国家主义派的囚徒许星吾和托洛斯基陈独秀取消派头头郑超群、楼国华等联合一起向我们进攻，大肆宣传取消革命的谬论。宣传监狱是革命者的“休养所”，不是“格斗场”，企图取消监狱中的斗争。我们也针锋相对地痛加驳斥，予以反击。结合了监狱的实际，发动难友展开辩论，揭发他们的丑恶面目，使他们自陷孤立，弄到哪个牢房都蹲不下去。最后，反动监狱当局只好把他们调到病房里享受优待去了。

大约在一九三五年夏天，监狱当局换了一个叫游湘的任第二科长（主管牢房囚徒）采用法西斯残酷手段迫害狱里的囚徒，取消牢房里“放风”，不许囚徒在牢房里走动和说话，